



南大商学评论

Nanjing Business Review

论 文

论企业家成长的社会制度与环境、学习能力和社会责任

赵曙明

动荡时代的组织理论：福柯伦理学的轨迹

陈 道 John Garrick

向最高峰前进：“政治动物”模型

Leo van Geffen

战略柔性、环境动态与基于顾客价值的竞争优势

王永贵

存货的资产减值风险及其影响因素

张朝宓 卓 毅 姜继威

双倍仲裁裁决？经济学家质疑印尼KBC公司损害赔偿一案

Louis T. Wells

法律制度、外资流的结构与金融危机

杜巨澜

研究文稿

顾客满意吗？影响中国餐馆服务费比例的一项实证研究

Michael C. Hsu

书 评

技术、竞争与规则的产生

黄泰岩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1

责任编辑:李 赟

装帧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大商学评论/刘志彪 鲁明泓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

ISBN 7-01-004198-9

I. 商… II. ①刘… ②鲁…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3596 号

南大商学评论

NANDA SHANGXUE PINGLUN

刘志彪 鲁明泓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2

字数:235 千字

ISBN 7-01-004198-9 定价:22.5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卷首语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加入 WTO，二十一世纪的企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和激烈竞争。站在历史的纵轴上，我们注意到，在目前变化和创新层出不穷的年代，各种新事物、新观念、新规则不断推陈出新，不断激励人们从多维角度去积极思索，主动行动。

面对未来，面对同行，南京大学商学院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追求更高学术水准与境界的共识引发了一直涌动于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份激情与梦想——创建一个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交流的理论平台。

《南大商学评论》应运而生。

《南大商学评论》分为经济卷和管理卷。经济卷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世界经济等，管理卷内容涉及公司战略、组织行为学、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会计、运作管理等学科领域。同时，本书也涉及到与经济学和管理学相关或交叉的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

本辑作为管理卷的第一辑,共由7篇论文,1篇研究文稿,1篇书评组成。

赵曙明的文章主要论述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企业家成长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篇论文结合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实际,论述了企业家精神的本质特征,分析了社会制度与环境对企业家成长和企业家精神产生的巨大影响,从四个方面指出了培育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

陈道和 John Garrick 研究的课题是管理学和伦理学相结合的一个边缘性的前沿领域,他们主要关注了将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置于社会理论及其分支即组织理论中加以考察。这些批判围绕着这样一些主张:后现代主义组织理论沉湎于意义的不确定性、语言相对主义和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尤有甚者,受福柯所激发的后现代组织理论家拒斥文化、历史和理性,而且在伦理、行为和变革方面贡献甚微。当这些主张被应用于组织分析时,作者对其表示反对。因为这些批判忽略了后现代主义对组织理论做出贡献的关键要素。作者鉴别了几处蕴藏丰富的漏隙,它们向后现代组织理论贡献了珍贵的内在精神特质,在福柯的后期著作中尤为如此。本文将该内在精神特质与其对立面置于相同的解构层面之上。作者认为福柯有关伦理行为的洞见是与话语的制度基础相关联的,而且也与有关于主体的规训知识的效果相关联。作者将这些见解与鲍曼的“后现代伦理学”联系在一起,而且还与塞内特有关“弹性资本主义”、公司重构和正在发生的制度变革等的研究联系起来。这些关联为组织研究导入了一种分析方法,该方法使我们能够可行地重估我们的认知结构,正是这些结构形成了运作主体性和本体。

Louis T. Wells 则从一个国际上备受争议的发生在印尼的 KBC 公司赔偿案出发,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判断法官究竟应如何计算外国投资应得赔付。如果对投资者和东道国判决不恰当,可能带来什么负面影响。文章还分析了为什么 KBC 公司动用诉讼手段解决问题,但同时期内发生在印尼的其他类似的纠纷却用协商方式而非法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的。

杜巨澜分析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另一种机制——不健全的法律制度通过引起外资流中的杠杆比率升高,从而对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所产生的影响。文中也指出由于债务主权的透明度以及债务拖欠的可证实性,使得外债债主能强有力地防止当地政府侵占。在新兴的资金吸收国中,由于其不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外资的流入倾向以外债为主,尤其是短期外债,而不是股票投资或直接投资。这样将导致更频繁的,破坏程度更深的金融危机。本文系统分析了法律体系,外资流对外债的偏斜,以及金融危机频繁性和严重性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南大商学评论》将秉持严谨、创新的发展理念,以海纳百川的特质整合各种最新的商学思想,吸取、融会、承继与发展中外经济与管理的各种新思维,加强国内外学者和管理实践者的学术与实践的研究与合作,拓展当今世界先进的商学理论的研究与运用。

《南大商学评论》期待着您深邃的目光和无私的帮助，也期待着您的思想与睿智从本书传播四方，渴望着我们一起带着激情与梦想走过未来的万水千山。

这是一个起点，从这里我们探索未知……

这更是一个平台，从这里我们接轨世界……

《南大商学评论》编委会主任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 教授 赵曙明博士

目 录

论 文

- 论企业家成长的社会制度与环境、学习能力和社会责任 3
赵曙明
- 动荡时代的组织理论：福柯伦理学的轨迹 16
陈 道 John Garrick
- 向最高峰前进：“政治动物”模型 34
Leo van Geffen
- 战略柔性、环境动态与基于顾客价值的竞争优势 47
王永贵
- 存货的资产减值风险及其影响因素 66
张朝宓 卓 毅 姜继威
- 双倍仲裁裁决？经济学家质疑印尼 KBC 公司损害赔偿一案 86
Louis T. Wells
- 法律制度、外资流的结构与金融危机 97
杜巨澜
-

研究文稿

- 顾客满意吗？影响中国餐馆服务费比例的一项实证研究 141
Michael C. Hsu
-

书 评

- 技术、竞争与规则的产生 159
黄泰岩
-

- 学人小传——周三多教授 168
王 同

CONTENTS

Articles

- On Social System and Environment, Learning Abilit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s 3
Zhao Shuming
- Organization Theory in Turbulent Times:
The Traces of Foucault's Ethics 16
Andrew Chan and John Garrick
- Advancing to the Top: The "Political Animal" Model 34
Leo van Geffen
- Strategic flexibility, Environmental Dynamics and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Perspective of Customer Perceived Value 47
Wang Yonggui
- The Risks of Inventory's Assets Devaluation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66
Zhang Chaomi, Zhuo Yi and Jiang Jiwei
- Double Dipping in Arbitration Awards? An Economist Questions
Damages Awarded Karaha Bodas Company in Indonesia 86
Louis T. Wells
- Legal Institutions, Structure of Foreign Capital Flow and Financial
Crises 97
Du Julian
-

Research Note

- Are Customers Satisfied? A Case Study of Factors Affecting
Tip Percentage in Chinese Restaurants 141
Michael C. Hsu
-

Book Review

- Birth of Technology, Competition and Rule 159
Huang Taiyan
-

- Zhou Sanduo, a Scholar in Management 168
Wang Tong



论文

Articles

论企业家成长的社会制度与 环境、学习能力和社会责任

赵曙明*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企业家成长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篇论文结合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实际，论述了企业家精神的本质特征，分析了社会制度与环境对企业家成长和企业家精神产生的巨大影响，从四个方面指出了培育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

关键词：企业家成长 企业家精神 社会制度和环境 学习能力 社会责任

* 赵曙明，南京大学商学院，电子邮件：zhaosm@nju.edu.cn.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各项改革正在深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新一轮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正在展开,随着“国家所有、分级行使产权”的新体制的建立,在中国已实行五十多年的国有资产“国家统一所有、地方分级管理”的模式将发生变化,这标志着中国的国企改革开始步入“深水区”。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中国企业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呢?是资金、资源、技术还是更优惠的政策?大量企业理论和实践表明,中国目前最缺乏和最需要的既非资金、资源,也非政策、技术,而是像韦尔奇、福特、松下幸之助、比尔·盖茨、李嘉诚这样一批富有创新精神、守法、守信、守则、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善于利用各种资源、能够创造经济奇迹的企业家。

因此,中国企业家制度建设、企业家的成长和创新精神的培育将是我国经济改革和企业变革过程中不断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

1. 企业家的内涵

“企业家”最早来源于法语中的 Entrepreneur 一词,有冒险家之意。1755年,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特龙将企业家定义为承担不确定性风险、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最早赋予企业家突出地位的是著名经济学家萨伊,他把将劳动资本和土地等要素结合起来进行生产的人称为企业家,认为“企业家就是把经济资源从生产效率较低和产量较少的领域转移到效率较高和产量较大领域的人”。经济学家熊彼特将其定义为“我们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彼德·德鲁克也认为,企业家是为谋取利润,并为此承担风险的人,他们是能开拓新市场、引导新需求、创造新顾客的人,是一批别出心裁、独具匠心、与众不同的人。马歇尔认为企业家是“承担风险的人”。戴维认为企业家经营事业的永恒动机是成就欲。美国学者奈特根据经济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不确定性,对前人的定义进行了修正。他指出,所谓“企业家”,就是那些“在极不确定的环境中做出决策”,并“必须自己承担决策的全部后果”的人。据此,他明确指出,“企业家”必然“是工商企业主,而不是负责日常决策、领取薪水的经理”。而马克思则认为:“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他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作为资本的承担者执行职能”;他惟一关心的就是利润;企业家是讲求实际、精明强干的经营者;企业家是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真正权威,一切较大规模的协作劳动都需要指挥,企业家正是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即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的人。

我国部分学者结合我国的国情，也对企业家概念进行了界定。有人认为，企业家能将所有生产资料集中起来，并对他利用的全部资本，他能支付的工资价值、利息和租金以及属于他自己的利润进行重新安排；还有的学者指出，企业家是以自己的人力资源为资本获取收益，以经营管理企业为职业，以使企业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标，并已取得一定业绩的人；还有人从身份角度对企业家进行界定，认为企业家的范围包括：企业的厂长（经理），董事会成员、副厂长（副经理），以及在企业中担任高级职务、出于经营决策管理层、掌握企业经营权的“经理阶层”。

以上论述尽管说法不一，但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企业家的一般特征。

2. 企业家精神

所谓企业家精神，说到底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在非主流经济学里，特别是奥地利学派是非常强调企业家创新精神的，熊彼特（熊彼特，2000）认为这是市场体制的最大活力。这些创新活动是：（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当代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德·德鲁克认为“企业家即为谋取利润，并为此承担风险的人，他们是开拓新市场、引导新需求、创造新顾客的人，是一批别出心裁、独具匠心、与众不同的人。”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推出的《中国企业家队伍成长与发展十年调查总报告》对中国企业家进行了深刻分析，十年来的调查提供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发现。在2000年8月到10月，针对“最能体现企业家精神的是什么？”这一问题，调查系统组织实施了“2000·中国企业经营者的问卷跟踪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经营者选择“勇于创新”的比重最高，为47.7%；选择“敬业”、“追求最大利润”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比重分别为35.2%、33.6%和31.5%；另外还分别有20.8%和19.6%的经营者选择了“敢于承担风险”和“乐于奉献”；与之相比，选择“吃苦耐劳”和“勤俭节约”的较少，比重分别为2.7%和1.7%。见表1所示。

表1 最能体现企业家精神的调查

勇于创新	敬业	追求最大利润	实现自我价值	敢于承担风险	乐于奉献	吃苦耐劳	勤俭节约
47.7%	35.2%	33.6%	31.5%	20.8%	19.6%	2.7%	1.7%

由此可见，目前的企业经营者把创新视为首要追求的企业家精神。

需要强调的是，职业经理人不等于企业家。企业家和经理，从创新层面来看，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企业家的含义是，这个东西本来是没有的，一切靠企业家。企业家创办公司，从无到有开创事业，具有的这种精神叫企业家精神。经理往往是指受到MBA教育，有名牌大学的学历，去管理一个现有的企业，这是传统意义上的经理。这两个阶层是有联系的：有企业家去当经理，也



有经理去当企业家，或者一个人同时既是企业家又是经理。但在多数的情况下，企业家和经理两种角色所要求的素质是不一样的。企业家像革命家一样，要有创业精神，要冒很大风险，也喜欢冒风险。所以企业家创建一个公司后，往往卖掉这个公司，不干管理而去办另一个公司，并以此为职业。虽然人们说财富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但创业者往往不是为了财富，而是就是喜欢创业。所以，企业家既有创业者“笑傲江湖”的自信，又有“爱我所爱，无怨无悔”的不懈追求。

三、企业家成长的社会制度与环境、 学习能力与创新精神培育

企业是一个社会的经济细胞，企业家以及与之相关的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发展的主导和灵魂，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中坚力量，是一个社会真正的“经济基础”。因此对于我们国家，最为稀缺的资源，正是企业家和企业家创新精神。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因素很多，突出反映在企业家的成长制度环境、企业家个人的学习能力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等方面。

1. 企业家成长的社会制度与环境

企业家精神或者企业家的追求首先表现为企业的发展，并因此而贡献于社会。他们并不崇尚在我们的文化中沉淀积累的“官本位”，通常也不会把事业的成功作为当官的跳板。直到目前为止，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仍不是职业企业家，国有企业领导者与政府官员之间的界限模糊，“官本位”现象十分严重。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制度制约了企业家的成长。

(1) 很多国有企业的领导者还是按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和选任程序产生的。计划经济使两种类型的领导者得以留存：一是原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本质上是行政官员）；二是政府行政机关的官员。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还主要是通过上级主管部门在企业内选拔、任命甚至直接由主管机关委派。在进行产权改革、明确我国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之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将企业的经营决策权在上述两种人之间分配和再分配，目前我国国有企业中控制权分配的现存格局就是这样形成的。这造成了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成为国有企业现存的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由于我国多年的政治、经济体制与文化背景导致“关系哲学”盛行，每个人权利的大小都取决于他拥有的关系网，这就使众多因素（诸如人情因素、个人私利因素、个人好恶因素、干部安置因素等）掺杂到企业家选拔的过程当中。

(2) 企业家政治化倾向明显。由于企业领导者的升迁、调动、任免的决定权在政府部门手里，甚至企业的兴衰存亡也掌握在政府的手中，因而企业经营者更愿意对上级政府或上级领导官员负责，而非对所在企业负责。中国改

革至今,同西方相比较,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和企业家需要利用的市场资源依然控制在政府手中。企业成立、上市、运转等环节都会受到政府的控制与干预,尤其是国有企业,没有政府,很难存活。政策风险对国有企业来说是最大的风险。即使是一名对企业负责的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也会首先尽力做好政界官员的工作,因为这样一来可以多提出一些政策方面的要求,也可争取到更多优惠的待遇。也正是这种政治化倾向导致经营者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做与经营活动无关或关系不大的事。经济学家张维迎指出“政府官员的偏好与我们企业家的偏好不一样。政府官员有政府的功能,而企业家要经营好企业,创造利润,创造财富。如果企业经营者追求政府的政治目标,就变成由政府官员的偏好来主导企业家的偏好。”某些国有企业的迅速增长、盲目做大、不断上新项目均与此有关。企业迅速增长符合政府“经济稳定增长”的政治要求:企业做大,政府官员才觉得有政绩,企业才能得到大力支持。这也导致政府官员通过各种正式或者非正式渠道“贿赂”企业经营者,使其经营决策更加符合政府官员的目标意图。

2. 企业家精神的内在本质——勤于学习,与时俱进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发现:中国企业家每天平均工作学习超过13个小时,绝大多数企业经营者的日均工作时间都超过了8小时。1997年的调查表明,企业经营者的时间分配情况平均为:工作11.23小时,学习2.14小时。也就是说,每天平均工作和学习的时间为13.37小时。此外在对“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的调查,认为主要原因是由于“自己非常努力”和“自己个人素质比较好”的分别占49.3%和33.7%。这样一个结果,与平时多数企业经营者在公开场合下言称的“政策好”、“领导支持”、“班子团结,员工支持”等因素大有不同。

大量事实表明,企业家不仅要善于学习和模仿别人的成功经验与做法,而且更要敢于突破与超越别人的成功经验与做法,同时还要敢于和善于在总结和综合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组织与机制的再创新,实现企业组织和制度的新突破,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因此,从企业家个人角度来看,企业家精神起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尽可能地学习现代经济学与工商管理知识,使自己的管理不断地规范化,尽可能地节约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二是他们能跟踪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积极主动地通过破坏性创新提升产业结构。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家群体正在蓬勃成长。但是,也应该看到,一些企业家群体,首先是从农村中产生的(吴敬琏,2001)。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农村承包制改革,使农民成为自己家庭农场的主人,在这个基础上,乡镇工商企业发展起来了,涌现了一批农民企业家。20世纪80年代初期,雇佣不超过2个帮手5个徒弟的“城镇个体经济”变得合法化,于是出现了一些城镇的手工业户,以及从事零售业和长途贩运的商贩。20世纪80年代中期,虽然仍然存在市场准入等多方面的限制,但是个体业主雇佣人数超过8



人不再被视为非法，这就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度比较缓慢，职业经理人和真正企业家在大企业中产生就更晚一些。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虽然企业家开始出现，但是他们的成长环境并不十分良好，因此企业家群体成长得并不快。由于行政力量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有的企业家就按照中国旧时商业文化中素有的官商勾结的传统，靠结交官府、玩弄钱权交易的把戏发财。当 20 世纪 90 年代末市场逐步走向规范，肃贪力度加大时，这种暴发户式的“企业家”就纷纷走向没落。从财富积累过程来看，海外有关机构对当今大陆财富榜上数名巨富的发家过程进行了分析，归结出他们的共同特点：

(1)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依靠“先富起来”的政策东风。

(2) 启动资金少得可怜。大部分人当初都是一穷二白，双手空空。启动资金多则一、两千元，少则几百元，他们的成功凭的是一股“誓死一搏”的理念。如，希望集团的刘氏兄弟 5 人，当初就是卖了手表、自行车，凑了区区数百元，开始了养殖事业。

(3) 这些先驱者最初多为个体、私营企业的小老板。据内地权威机构统计，富翁“出身”全民所有制的约占 0.4%， “出身”集体所有制的约占 3.4%， “出身”个体工商和私营企业的占据了 96%。

(4) “出身”决定了这批人员的文化水准普遍较低。1994 年有统计数字表明，当时的 30 位亿万富翁中，70% 出身农民，70% 只有小学文化。

(5) 这个群体的另一个特点是发家速度极快，多数只用了 10 年，有的甚至更短，只有几年！而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富翁积攒数百万美元的资产，平均要几十年，而西方社会和海外华人，则更是需要三代以上人的努力。

总体来看，这些亿万富翁“发家的秘诀”是：具有市场经济的意识，在竞争尚不充分的阶段，最先抓住了巨大的机会。他们充分利用了中国体制转轨的条件，在土地、房地产、有价证券等经济要素规律成形之前，利用开发前后的价格差、时间差赚足了大笔金钱。少部分人是经营“奇才”，在利用发明专利的过程中，赢得了市场。最关键的一条：他们在关键时刻都利用了银行这个金融机构，“借钱下蛋”。资料显示，全国商品房投资中三分之一是利用银行贷款，相当一部分人利用贷款炒地产、房产，一夜之间就可以赚几十万甚至几百万。这可以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数千万平方米的空置住房的资金多数是银行贷款的事实来证明。虽然这里面也有成功的人，但是使用贷款迅速发达却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这一特殊的历程，客观上造成了企业经营者自身素质不高，创新能力不足。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不是精通管理与技术的职业企业家，受教育程度低。据统计，我国企业家队伍中接受过正规学历教育的人数约为 24.6%，国有企业中的比例更低。这就致使决策能力、预见

能力、创新能力、表达能力与学习能力等欠缺，领导者更热衷于官场钻营，喜欢专权，做事跟着感觉走，有一点成绩便沾沾自喜，为自己树碑立传。熊胜绪在《企业家》一文中这样写到：“中国的企业家冒险精神不够，‘服从上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保守观念依然存在。在知识结构上，现代化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很欠缺；在能力结构上，不善于从商品经济的风云变幻中驾驭企业，应变能力较差；在思维方式上，不善于全方位思维，而惯于单向思维，对复杂的事情容易做出简单的决策。”这段话精确地概括出了我国企业家自身存在的基本缺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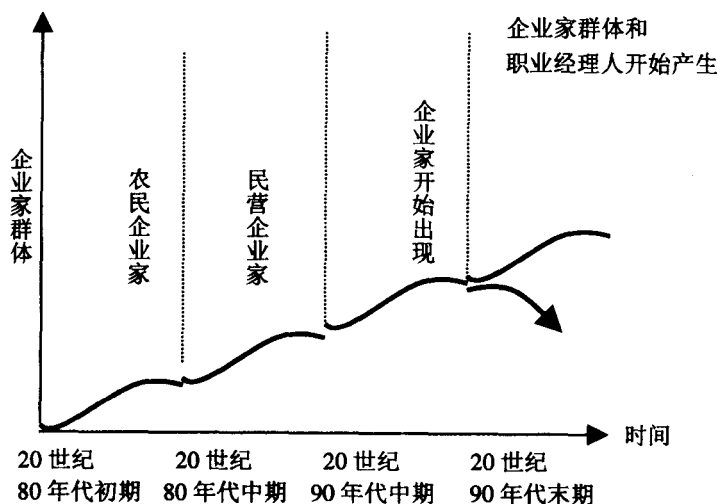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企业家的成长轨迹

一个生动的事例是，美国这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之所以能够率先迎来知识经济，是因为美国人很容易“接受自主，自我改造，乃至自我革新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带到商业领域。正是这种精神及与之相适应的规则，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那种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的封闭、墨守成规、论资排辈、追求平衡、“中庸”等等，则明显地抑制了人们的创造性。这样的文化氛围与企业家精神是不协调的，很难使企业家脱颖而出。就在法国和德国这样非常成熟的市场体制下，由于清规戒律很多，所以就产生不出硅谷。硅谷在美国诞生并不是偶然的，硅谷文化的精髓就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可喜的是，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学习能力正在提高。以1998年企业家使用互联网调查结果为例，会使用计算机的企业家比重为63.7%，与1997年调查的43.5%相比，有较大幅度提高。在样本企业中，近半数的企业和企业经营者已经使用国际互联网，但拥有企业网址和个人网页的比重较低。到1999年，对互联网“非常了解”和“了解”的人数分别占4.0%和75.7%，与1998年



相比，又有显著提高。

3. 守法、守信、守则、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在美国，安然、世通等公司一系列财务丑闻使 500 强公司 CEO 的诚信道德受到质疑；在中国，富豪纳税问题（多数是企业家阶层）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一些企业家普遍缺乏对规则和秩序的尊重，相当一部分以“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为标榜，他们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其实是以伤害大多数“按牌理出牌的人”的利益为前提的，是通过破坏市场秩序、损害社会整体利益而趁乱取胜。

造成这种现象除了企业家个人的因素外，企业家制度不健全是其主要原因。在西方，虽然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争论很多，但社会责任观念已经相当广泛地被企业和企业家所接受，从社会制度角度来看，对企业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明确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 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密尔顿·弗里德曼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在自由企业和私有产权制度下，公司经理也是企业所有者的雇员，并直接对其雇主负责。他的责任就是按照雇主的愿望来经营企业，主要表现为在遵守基本的社会准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赚钱。”
- 哈罗德·孔茨和海因茨·韦里克认为：“公司的社会责任就是认真地考虑公司的一举一动对社会的影响。”
- 约翰·B·库伦认为：“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对社会负有超越盈利的责任这样一种思想，也就是说，社会责任意味着一个公司不仅要为股东谋利益，还要考虑其他成员（如顾客、供应商）等的利益。”
- 詹姆斯·波斯认为：“公司的社会责任意味着一个公司应该对其影响他人、社区和环境的行为负责任。它要求如果一个公司的行为严重伤害了该公司的某些利益相关者，或者其基金能够用于改进社会福利，该公司就应该放弃一部分利润。”
- 斯蒂芬·P·罗宾斯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企业追求有利于社会的长远目标的义务，而不是法律和经济所要求的义务。”

事实上，对一个企业来说，由于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其社会责任意识和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是不同的。为此斯蒂芬·P·罗宾斯提出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四阶段模型。如图 2 所示。在第一阶段的企业家，主要是通过寻求使成本最低和利润最大的生产方式来提高股东的利益；到了第二阶段，他们集中于人力资源管理，为了获得、留住和激励优秀的雇员，他们会扩大雇员的权利和改善工作条件；在第三阶段，企业家们会拓展他们的管理目标，注意公平的价格、高质量的和安全的的产品以及与供应商的良好关系；在第四阶段，管理者履行的社会责任同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经济观的定义相一致，在这一阶段，企业家将其经营的事业视为公众财产，因而对社会整体负责，对提高公众利益负责。

由此可见，社会价值体系或者诱导信号，就是由社会公认的对不同部门、不同领域、不同个人的评价标准所组成的有机体系，它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并且在潜移默化地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促使人们各司其职、各尽